

接觸偏差同儕、緊張因素及青少年偏差行為
之研究：中介效果模式之驗證

**The Study of Relationship among Deviant
Peer, Strain and Juvenile Delinquency: A Test
of a Mediated-Effects Model**

田光祐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譚子文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與心理輔導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董旭英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Kuang-You Tien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Air Forc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zyy-Wen Tan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Counselling,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E-mail: tantzyywen@gmail.com

Yuk-Ying Tung

Professor,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eng-Kung University



摘要

本研究主要依據一般化緊張理論及社會學習理論之觀點，探討緊張因素、接觸偏差同儕與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影響。本研究調查對象為嘉義市及嘉義縣國民中學學生，有效分析樣本為 422 名國中生。至於數據分析方面，採用迴歸分析所搜集之數據。本研究發現：(1) 緊張因素與接觸偏差同儕間具關聯性；(2) 緊張因素、接觸偏差同儕對偏差行為的發生均具有直接效果；(3) 接觸偏差同儕對與教師負面關係、與同儕負面關係及偏差行為間之關聯性具中介效應。依據研究的分析結果，文中就未來對青少年偏差行為之研究與輔導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字：緊張因素、接觸偏差同儕、青少年偏差行為、中介效果



Abstract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viewpoints of the general strain theory and deviant peer, attempted to find how strain and deviant peer would influence juvenile delinquency. Sample of the study consisted of 422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Chiayi City and Chiayi County. The regression techniqu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found that: (1) strain was related to deviant peer; (2) strain and deviant peer had significant direct impacts o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deviant behavior; (3) there were mediating effect of deviant peer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relationship with teacher and peer and juvenile delinquency.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guidance and further studies are also provided.

Keywords: strain, deviant peer, delinquency, Mediating



一、前言

Agnew (1992) 一般化緊張理論 (the general strain theory) 指出許多緊張因素將導致犯罪的可能性, 而此種緊張因素的來源包括未能達到期望中的目標、生活中個人失去正向的刺激及生活中負面刺激的產生, 皆可能使個體產生憤怒、挫折感、敵意等負面情緒。這些不愉快的情緒會驅使個體採取行動面對, 若無法透過合法的途徑消除因緊張所引發的負向情緒, 個體將可能採取非法或犯罪的手段加以因應。奠基於 Agnew 理論及實徵研究即顯示, 青少年與父母、教師、同儕負面關係等緊張因素, 與偏差行為間有重要關聯性 (Batsche & Knoff, 1994; Espelage, Bosworth, & Simon, 2000; Olweus, 1993)。有別於一般化緊張理論, 社會學習理論 (social learning theory) 則強調青少年與偏差同儕的接觸, 容易學習到犯罪的技巧, 且能增強青少年發生偏差行為的動機、內驅力、合理化及態度, 便容易以習得偏差行為的反應模式作為生活上不如意的對抗 (Sutherland, 1939; Akers, 1985)。眾多有關接觸偏差同儕的研究證實, 接觸偏差同儕是預測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高風險因子 (Akers & Cochran, 1985; Cheung & Yeung, 2010; Fite et al., 2011; Pratt et al., 2010)。從一般化緊張理論及社會學習理論的立論基礎, 我們可以觀察到, 雖然二者均強調偏差行為的重要性, 但是一般化緊張理論焦點於引致偏差行為的因素, 社會學習理論則聚焦在偏差同儕的效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為什麼有些同樣經歷緊張因素的青少年並未因此而產生偏差行為? 在緊張因素與偏差行為之間是否具有什麼樣的中介機制, 而使得青少年向偏差行為傾斜? 再者, 社會學習理論並無法清楚說明影響青少年接觸偏差同儕的最根本原因, 亦即忽略了是何種因素將青少年推向偏差同儕, 再習得偏差行為。



承上所述，如果偏差行為的發生與否既受到與父母、教師及同儕負面關係等緊張因素的影響，也受到接觸偏差同儕的影響；而與偏差同儕的接觸可能是源於個體與父母、教師、同儕負面關係等緊張因素之影響，且亦影響到偏差行為的發生；那麼其中所隱含的命題一是，國中階段之青少年與父母、教師及同儕負面關係可能對接觸偏差同儕有所影響，且其與父母、教師、同儕負面關係，以及接觸偏差同儕均可能對其偏差行為產生與否有所影響。命題二則是國中生與父母、教師及同儕負面關係等緊張因素，會透過接觸偏差同儕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產生影響，亦即接觸偏差同儕在緊張因素與偏差行為之間具有中介效果。然而以往國內甚少有較完整、系統化之檢驗接觸偏差同儕因素對緊張因素與青少年偏差行為成因解釋的實徵性研究，故在探討現代青少年偏差行為形成的影響機制上產生了侷限性。有鑒於此，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運用修訂及補強後之一般化緊張理論解釋觀點，並整合社會學習理的接觸偏差同儕，嘗試建構一個更完整，更具適合性的青少年偏差行為成因之嶄新解釋模型。據此，本研究希望能藉由探討青少年緊張因素、接觸偏差同儕及偏差行為之關聯性，並以接觸偏差同儕為中介變項，期能建立三者間之關聯結構模式，幫助了解青少年偏差行為的成因，以補綴相關領域文獻的不足，並為日後從事相關研究者及教育學、犯罪學單位作為參考。

二、文獻探討

(一) 國中生的主要緊張因素來源

Agnew (1992) 一般化緊張理論的核心概念強調所謂「負面影響



狀態 (negative affective)」, 意指個人因負面或有破壞性的社會人際關係而產生憤怒、挫折、不公及負面的情緒, 當個體在經歷一個或多個負面情緒之後, 導致壓力的產生, 此時受到個人特質及社會因素影響, 個體可能因此訴諸偏差或犯罪行為, 藉以減低其不滿及不安的情緒。對於正處於高密度的人際生命事件階段之青少年而言, 在日常生活中面臨各種的生活壓力與緊張時, 青少年可能取決於他們所處的家庭、學校與同輩團體的人際網絡環境去應付緊張所帶來的負面效應 (Drapela, 2006; Hay, 2003; Higgins、Piquero, & Piquero, 2011; Iselin, Mulvey, Loughran, Chung, & Schubert, 2012); 換言之, 如果青少年與父母、教師及同儕關係的內容是負面、疏離、緊張的關係, 將可能引致偏差行為的發生。這是因為青少年為應付這些負面關係所帶來的緊張, 若又無法以正常的手段或方法, 避免或降低負面情緒時, 通常會以從事非法的策略去應對 (Agnew, 2006)。

國外眾多應用 Agnew 一般緊張理論的研究即指出, 與重要他人的負面關係和青少年偏差行為間具有高度關聯性。如 Montgomery、Thompson 和 Barczyk (2011) 的研究發現, 與父母的負向關係可以預測青少年的非暴力犯罪; Dove (2001) 及 Shader (2004) 的研究一致指出, 來自家庭的衝突, 尤其是與父母關係的不和諧、破裂, 是導致青少年出走家庭產生偏差行為的主因。Moon、Hwang 和 McCluskey (2011) 的調查結果顯示, 來自於教師的身體和情緒處罰的緊張, 對偏差行為有著顯著效果, Moon、Hays 和 Blurton (2009) 的研究亦發現教師與大學生間的負向關係, 與偏差行為有著關聯性; Higgins、Piquero 和 Piquero (2011) 則發現, 同儕的拒絕和偏差行為之間具有高度關聯性。在國內, 譚子文、范書菁 (2010) 以「台灣教



育長期追蹤資料庫」2005年下半年第三波調查之10,658名高中學生為對象的研究發現，與家人的負面關係愈高，高中生愈容易發生偏差行為，Tung（2001）以台灣北、中、南都會地區之國中生作為分析樣本，研究結果發現青少年與父母的負面關係關導致偏差行為的發生；吳齊殷、李婷潔（2008）的研究亦指出和父母的關係破裂或不穩定，對青少年的情緒適應有顯著且長期的影響，與之後所發生的偏差行為更有著高度關聯性。同時，教師的排斥、學生之同儕關係是青少年偏差行為產生之重要因素（周愷嫻，2008:171）。

誠如前述，青少年與父母、教師、同儕的負面關係所造成的壓力、挫折，一旦適應不良無法承擔，則極易造成偏差行為的發生。反之，青少年若能從與父母、教師及同儕的互動關係中獲得一些正向的回應，是可以減緩偏差行為的發生。而本研究即歸納上述文獻探討，將青少年與重要他人的負面關係區分為與父親負面關係、與母親負面關係、與教師負面關係及與同儕負面關係等四類，以瞭解其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影響。

（二）接觸偏差同儕

Bandura（1973）認為個體的行為易受到積極強化、消極強化、無強化以及懲罰的影響，而改變了行為的發生機率。Bandura進一步指出個體的學習係行為、個人與其特殊的社會環境持續交互作用的歷程。而這一連串的學習活動，所涉及的刺激反應，又是個體習得社會行為的主要途徑。故而，犯罪或偏差行為是學習而來的論點，亦早已被犯罪學界應用在青少年偏差行為領域，如 Akers（1997）、Burgess 和 Akers（1966）等犯罪學者強調青少年與較多偏差行為的同儕接觸，



容易學習到違規行為的傾向。這是因為青少年在成長的過程中，會觀察到偏差同儕的示範性行為，如犯罪的技巧，犯罪的動機、驅力（drives）、合理化和態度；或是聽到偏差同儕對行為是否正確的解說，即使尚未曾跟隨偏差同儕去實際從事表現出之外顯行為，他還是可以學到該偏差行為的動機、傾向等。據此，對青少年而言，其偏差行為會隨著與偏差同儕接觸之頻率（frequency）、持續（duration）、優先性（priority）和強度（intensity）而產生不同的影響（Sutherland, 1947）。

眾多有關接觸偏差同儕與青少年偏差行為關聯性之研究均獲得一致的結果，接觸偏差同儕與青少年的偏差行為具有高度關聯性（Barnow et al., 2004; Trucco, Colder, & Wiczorek, 2011; Wiesner, Capaldi, & Kim, 2012），與偏差同儕密切的接觸、結合，青少年愈可能發生偏差行為，並主張偏差友伴是導致孩子從事偏差行為的真正原因（Akers, 2009; Felson, 2003; Zimmerman & Vasquez, 2011），若再從社會化的歷程審之，與偏差同儕的接觸更會削弱其它社會機制，如家庭及學校，對偏差行為的抑制能力（張楓明，2007；董旭英，2007）。這是因為青少年常與不良同儕接觸，便容易以習得偏差行為的反應模式作為對家庭、學校等社會化機構的對抗，進而加劇青少年與父母、教師、同儕負面關係對偏差行為的影響。兼以，儘管偏差同儕並非導向青少年走向犯罪或偏差行為的唯一因素，卻是少數能藉由與其他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因素間的交互作用，而間接或直接影響青少年行為的因子。

由以上的文獻探討，我們可以發現，青少年接觸偏差同儕會削減個體與社會的交織，無法形成社會支持網絡以節制犯罪或偏差行為的發生。甚而青少年與父母、教師及同儕負向的關係網絡，會因為接觸



偏差同儕的效應，而增加犯罪或偏差行為發生的可能性。但實徵文獻對此問題之討論，囿於研究旨趣，甚至是研究工具的侷限，因而大都僅針對接觸偏差同儕與偏差行為間之關係進行探討。鮮少有研究以較為全盤的觀點加以探討緊張因素、接觸偏差同儕與偏差行為間之關係，致使推論性有所侷限，因此有關此議題仍值得進一步探討。

（三）緊張因素、接觸偏差同儕與偏差行為的關係

Agnew (1991) 的一般化緊張理論，是建構在一個社會心理學層面上，除了考慮到社會結構及環境因素外，更考慮到個人特質對偏差行為所造成的影響。並將緊張來源加以細分，且其均與個人所處的環境，以及與生活中重要他人的互動有關。此外，依據 Agnew 和 White (1992:479-480) 的研究，一般化緊張理論的解釋力應被估量為社會控制及差別接觸理論變項之測量綜合，這是因為壓力能夠藉由弱化青少年與傳統重要他人間之社會鍵(尤其當這種壓力伴存著負面親子關係時)而導致偏差行為；又偏差同儕也可能提供以偏差行為及(或)濫用藥物來對壓力作反應的機會 (Hoffmann & Su, 1998)。由此可觀察到，與他人的負面關係和青少年偏差行為之間，尚受到接觸偏差同儕制約因素的影響。也就是說，青少年與父母、教師及同儕的社會關係網絡如果是匱乏、破碎、負向的，可能招來更多的拒絕、排斥和緊張，而使得環境更不利於其正常發展，而向偏差同儕靠攏以獲取奧援或認同，再對偏差行為產生影響。

對此，Drapela (2006) 以 16,489 名國中二年級的學生為對象之研究顯示，經歷日常生活負面事件(如與他人的負面關係)的青少年，會向偏差同儕尋求支持、友愛、認同。Hawkins、Catalano 和 Miller



(1992)則指出偏差同儕與家庭的交互作用所造成的緊張，對青少年的偏差行為有著持續性及重大的影響。Dishion、Andrews 與 Crosby (1995)發現，進入青春期的青少年，由於交友層面擴大，與同儕之間的關係會轉為更加親密，同儕對他們而言具有舉足輕重的角色地位及功能，若其結交的同儕中具有偏差行為，則這些偏差友伴將可能提供青少年接觸或從事偏差行為的機會，亦可能以施加壓力的方式或增強其偏差行為的結果，讓青少年對偏差行為之態度、動機產生合理化的藉口，進而衍生出反社會行為。上述這些緊張來源及研究結果清楚的告訴我們，受到從事偏差或反社會行為的同儕影響，青少年會藉由模仿偏差行為來適應或舒緩因此而產生的緊張。

從以上的探討可知，與父母、教師及同儕的負面關係既可能影響青少年與偏差同儕接觸的程度，又與青少年偏差行為有實徵關聯。由此推之，與父母、教師及同儕的負面關係，是導致青少年轉向依賴偏差同儕團的促發因子，那麼可以預期的是當孩子在面對犯罪或偏差行為的機會時，如果考慮或重視他們的想法或感受並維繫良好的關係，將不致於將他們推向偏差同儕及發生犯罪或偏差行為。亦即與父母、教師、同儕的負向關係對其接觸偏差同儕的程度，及是否會從事犯罪或偏差行為的影響均是重要的關鍵因子，且接觸偏差同儕也是偏差行為發生的重要影響因素。因此，當國中生與偏差同儕有著較高次數的接觸時，其偏差行為的產生是否仍如過去一般，繼續受到與父母、教師及同儕負面關係的影響，實值得進一步加以檢視；兼以國中階段青少年接觸偏差同儕是否扮演著緊張因素與偏差行為之間的中介角色，在過去的實徵研究甚少討論。準此，本研究將檢驗「接觸偏差同儕對緊張因素與偏差行為間關係的中介效應」。



最後應該加以說明的是，Agnew 強調在討論緊張因素與偏差行為之關聯時，必需考量其他個人因素之效應，如性別、年齡。而家庭社經地位愈高（如父母教育程度、家庭經濟收入）的家庭，所擁有的社會資本也愈豐富，父母愈能為子女營造良好的生活環境和提供充沛的教育設備，有助於子女教育成就之取得，亦會限制其子女參與偏差活動（Israel, Beaulieu, & Hartless, 2001; Parcel & Dufur, 2001），因此當青少年遇到挫折時，家庭社經地位較高者容易獲得支持，而能減低其偏差行為發生的機率。故本研究將納入性別、年級、父母教育程度及家庭收入等控制變項用以檢視各變項之間的關係。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背景、動機、變項間之相關文獻支持及探討後，建立起研究架構如圖 1，並建立各項假設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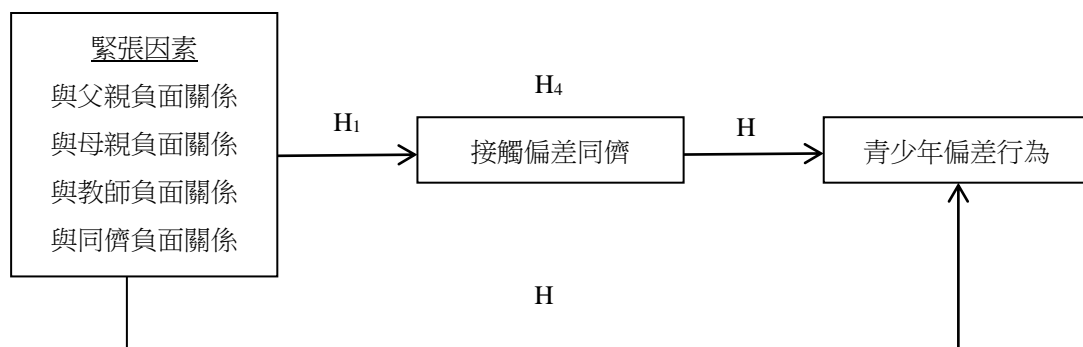


圖 1 研究架構

假設 1：緊張因素對接觸偏差同儕有正向影響。

假設 2：緊張因素對青少年偏差行為有正向影響。

假設 3：接觸偏差同儕對有青少年偏差行為正向影響。

假設 4：接觸偏差同儕在緊張因素與青少年偏差行為扮演中介角色。

(二) 研究對象

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調查對象為嘉義市及嘉義縣等兩個主要行政區域之國中生，但審酌嘉義縣之人口數約為嘉義市之人口數的二倍，為避免樣本性質太近似，本研究由嘉義市選取二所國民中學，嘉義縣則選取四所國民中學進行調查。再者，本研究主要係採用叢聚抽樣方式，從各選取調查之學校中，以班級為單位隨機選取群組，而被選出的組群的所有成員皆為樣本。其中各學校班級被抽取的機率皆相等，使樣本的分配接近母體。對隨機抽樣抽選出的每所國民中學學生，以班級為單位每一年級隨機各抽選一個班級，最後共由六所國民中學中抽出十八個班級。最終，有效樣本數為 422 名國中學生（男 224 名，女 198 名）。

(三) 問卷變項的定義與衡量

本研究以問卷為主要衡量工具，詢問填答者對於該題項的同意程度。有關各變數之操作型定義與其問卷題項來源，詳述如下：

1. 依變項

本研究之國中生偏差行為量表，係以「違反團體規範的行為」作為偏差行為之涵義，並參酌許春金、孟維德（1997），許春金、馬傳



鎮(1997)以及黃富源(2000)相關量表中之偏差行為題項修訂而成。再以主軸因子分析法萃取因素，以直接斜交法進行因素分析，保留特徵值大於 1，且選取因素負荷量大於 .45 的題項。計萃取出一個因素，因素負荷值介於 .51 至 .69 之間，可解釋之變異量為 37.14%，測得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76。所包含的題項為抽煙、打架、放學後流連網咖、飆車、與有犯罪習性的人或幫派份子往來、出入賭博性電玩等不良場所等六個題項。至於建構偏差行為指標時，本研究以上述六個項目所取的平均值表示，其最小值為 1，最大值為 5，即國中生偏差行為變項所取的值愈高，代表其偏差行為發生也愈高。

2.自變項

(1) 緊張因素—與重要他人負面關係

A. 與父親負面關係

本變項主要在測量受試者與父親之間關係的緊張程度。此部分主要依據 Agnew (1992) 之一般化緊張理論，並將範疇凝聚於父子互動層面後，參考許春金、馬傳鎮 (1997) 之「大台北地區少年發展研究問卷(一)」、黃富源 (2000) 之「青少年日常生活量表」，以及 Mazerolle 和 Maahs (2000) 與 Xiong 等人 (2008) 之研究，加以修訂而成。以主軸因子分析法萃取因素，並以直接斜交法進行因素分析，保留特徵值大於 1，且選取因素負荷量大於 .50 的題項，剔除因素負荷值較低的題目，以提高量表變項之效度。計萃取出一個因素，因素負荷值介於 .56 至 .88 之間，可解釋之變異量為 67.59%，所包含的題項為「父親在家中常常打你、罵你」、「父親常常因為他自己的問題



而責備你」、「即使你說實話，父親還是不信任你」、「父親常常誤會或冤枉你根本沒做過的一些壞事」、「父親對你的問題漠不關心」、「因為父親常年在外出工作，所以很少關心你」、「父親只顧著他自己，而忽視你的存在」、「父親根本不在乎你做什麼事情」、「父親常常因為你做的事感到不開心」、「就算你再怎麼努力表現，還是得不到父親的歡心」等十個問題。此部分之計分方式，依序由填答「非常不符合」、「不符合」、「符合」、「非常符合」者，分別給予 1 至 4 分，受試者填答之得分愈高，表示父子間之關係愈負向、愈緊張，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93。

B. 與母親負面關係

本變項主要在測量受試者與母親之間關係的緊張程度。此部分主要依據 Agnew (1992) 之一般化緊張理論，並將範疇凝聚於母子互動層面後，參考許春金、馬傳鎮 (1997) 之「大台北地區少年發展研究問卷(一)」、黃富源 (2000) 之「青少年日常生活量表」，以及 Mazerolle 和 Maahs (2000) 與 Xiong 等人 (2008) 之研究，加以修訂而成。以主軸因子分析法萃取因素，並以直接斜交法進行因素分析，保留特徵值大於 1，且選取因素負荷量大於 .50 的題項，剔除因素負荷值較低的題目，以提高量表變項之效度。計萃取出一個因素，因素負荷值介於 .60 至 .89 之間，可解釋之變異量為 68.79%，所包含的題項為「母親在家中常常打你、罵你」、「母親常常因為他自己的問題而責備你」、「即使你說實話，母親還是不信任你」、「母親常常誤會或冤枉你根本沒做過的一些壞事」、「母親對你的問題漠不關心」、「因為母親常年在外出工作，所以很少關心你」、「母親只顧著他自己，而忽視你的存在」、「母親根本不在乎你做什麼事情」、「母親常常因為你做的事感到不開心」、「就算你再怎麼努力表現，還是得不到母親的歡心」



等十個問題。此部分之計分方式，依序由填答「非常不符合」、「不符合」、「符合」、「非常符合」者，分別給予 1 至 4 分，受試者填答之得分愈高，表示母子間之關係愈負向、愈緊張，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94。

C. 與教師負面關係

本變項測量在測量受試者與老師之間關係的緊張程度。其題項內容之編製，主要依據 Agnew (1992) 之一般化緊張理論，並將範疇凝聚於師生互動層面後，參考許春金、馬傳鎮 (1997) 之「大台北地區少年發展研究問卷(一)」、鄧煌發 (2001) 之「青少年生活量表」，以及 Mazerolle 和 Maahs (2000) 之研究，加以修訂而成。以主軸因子分析法萃取因素，並以直接斜交法進行因素分析，保留特徵值大於 1，且選取因素負荷量大於 .50 的題項，剔除因素負荷值較低的題目，以提高量表變項之效度。計萃取出一個因素，因素負荷值介於 .81 至 .94 之間，可解釋之變異量為 77.14%，由十一個題項組成，包括「你覺得老師對你有偏見」、「你覺得老師給你的感覺是冷漠的」、「因為跟老師發生過衝突，所以不想去學校」、「你覺得老師常常找理由來處罰或刁難你」、「你會盡量避免看到老師」、「你覺得老師不願意花時間在你身上」、「你覺得老師很喜歡嘲笑或諷刺你」、「即使你說實話，老師還是不信任你」、「不管你再怎麼努力，還是得不到老師的肯定」、「當你想在課堂上發表意見時，老師都會忽略你的存在」、「你覺得不被老師喜歡，有被排斥或不公平的待遇」等問題。再者，題項的計分方式分為四個等級，依序由填答「非常不符合」、「不符合」、「符合」、「非常符合」者，分別給予 1 至 4 分。受試者得分愈高，表示師生關係愈負向、愈緊張，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97。



D. 與同儕負面關係

負向同儕關係變項主要在測量受試者與同學及朋友之間的關係，並據以計算彼此關係的緊張程度。此部分主要依據 Agnew (1992) 之一般化緊張理論，並將範疇凝聚於人際互動層面後，參考許春金、馬傳鎮(1997)之「大台北地區少年發展研究問卷(一)」、鄧煌發(2001)之「青少年生活量表」，以及 Mazerolle 和 Maahs (2000) 之研究，加以修訂而成。以主軸因子分析法萃取因素，並以直接斜交法進行因素分析，保留特徵值大於 1，且選取因素負荷量大於 .50 的題項，剔除因素負荷值較低的題目，以提高量表變項之效度。計萃取出一個因素，因素負荷值介於 .77 至 .90 之間，可解釋之變異量為 71.00%，所包含的題項為「不管你再怎麼努力，還是得不到大家的肯定」、「你覺得同學排擠你、討厭你」、「在班級中，你常被別人嘲笑」、「你覺得同學不關心、不在乎你」、「你沒有什麼可以傾吐心聲的好朋友」、「你覺得同學很難相處」、「你覺得沒有朋友喜歡你」、「你覺得沒有同學瞭解你、喜歡你」、「你總是獨來獨往，很少跟朋友在一起」等九個問題。題項的計分方式同樣分為四個等級，依序由填答「非常不符合」、「不符合」、「符合」、「非常符合」者，分別給予 1 至 4 分。受試者得分愈高，表示該國中生與同儕間的關係愈處於負向與緊張的狀態，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96。

(2) 接觸偏差同儕

係依據 Sutherland(1947)之差異接觸理論(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theory)，並參考范國勇(2001)之研究後，建構出下列五項題目做



為測量國中生之接觸偏差同儕情形，包括已經輟學的朋友；經常逃學或蹺課的朋友；曾經逃家或離家出走的朋友；曾有違法行為而進出警察局的朋友；曾經打過群架（或集體械鬥）的朋友。計分方式以五點量表測量，包括「沒有」、「1-2 人」、「3-5 人」、「6-10 人」，以及「11 人以上」，回答人數愈多者代表其接觸偏差行為的友伴愈多，內部一致性信度為.86。

3.控制變項

- (1) 性別：由受試者勾選，男生取值為 1，女生取值為 0。
- (2) 年級：此題項直接詢問國中生之就讀年級，從一年級至三年級分為三個等級。
- (3) 父親教育程度：由受試者勾選其父親之教育程度為何，計分方式依序由填答「不識字」迄「研究所以上」等七個等第分別給予 1 至 7 分，受試者得分愈高，表示其父親之教育程度愈高。
- (4) 母親教育程度：由受試者勾選其母親之教育程度為何，計分方式亦依序由填答「不識字」迄「研究所以上」等七個等第分別給予 1 至 7 分，受試者得分愈高，表示其母親之教育程度愈高。
- (5) 家庭經濟狀況：由受試者勾選其家庭經濟狀況，計分方式依序由填答「下」迄「上」等 5 個等第分別給予 1 至 5 分，受試者得分愈高，表示其家庭之經濟狀況愈佳。

(四) 資料分析與統計方法

本研究以平均數、標準差等描述性統計分析來檢視各變項之分佈情形；再由相關分析統計方法分析各變項與偏差行為間的關聯性；最



後則以迴歸分析及階層迴歸分析技術考驗本研究假設，並以未標準化迴歸係數 (B) 及標準化迴歸係數 (β) 說明自變項自不同模組中變化所得圖像。在接觸偏差同儕是否為緊張因素與偏差行為之中介變項的考驗方面，依據 Baron 和 Kenny (1986) 所提出的中介效果檢驗方式，中介變項的成立必須具有四個要件：(1) 預測變項 (X) 可顯著預測中介變項 (M) (圖 2 路徑 a 達顯著水準)；(2) 中介變項 (M) 可顯著預測效標變項 (Y) (圖 2 路徑 b 達顯著水準)；(3) 預測變項 (X) 可顯著預測效標變項 (Y) (圖 2 路徑 c 達顯著水準，即直接效果)；(4) 同時將預測變項 (X) 與中介變項 (M) 放入迴歸模型中，若原先預測變項 (X) 對效標變項 (Y) 的迴歸係數 c 因此降低 (但仍達顯著) 或變成不顯著，則可成立中介變項的假設。當迴歸係數 c 由顯著變不顯著時，表示預測變項 (X) 對效標變項 (Y) 的效果被中介變項 (M) 完全中介；當迴歸係數 c 雖然降低，但仍達顯著水準時，表示預測變項 (X) 對效標變項 (Y) 之效果被中介變項 (M) 部分中介 (圖 2 路徑 c' 達顯著水準，即中介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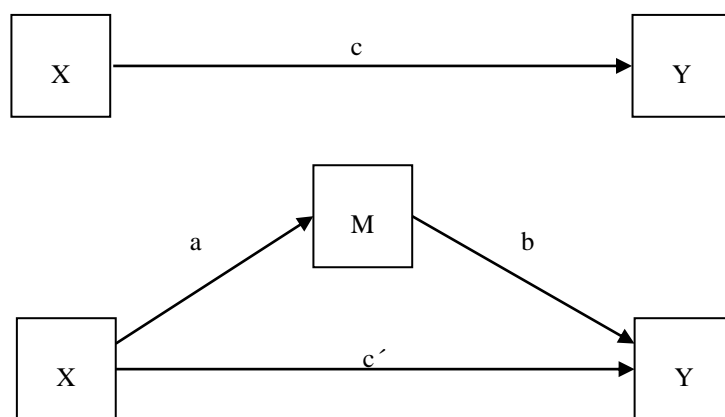


圖 2 中介變項要件圖 (引自 Baron & Kenny, 1986)



當完全或部分中介的假設成立，則繼續進行 Sobel 檢定 (Sobel test) 以考驗中介效果值 (ab) 的顯著性，檢驗公式如下：

$$Z \text{ score} = \frac{a \times b}{\sqrt{b^2 S_a^2 + a^2 S_b^2 + S_a^2 S_b^2}}$$

a、b 分別為路徑 a、b 之未標準化迴歸係數， S_a 、 S_b 分別是 a、b 的標準誤，以瞭解未標準化迴歸係數 c 和 c 間之差異是否達顯著，當 Z 值大於 1.96 或小於 -1.96 時，表示此部分的中介效果 (mediated effect) 達 .05 的統計顯著水準 (Frazier, Tix, & Barron, 2004)。此外，Kenny (2011) 建議在檢驗中介模式時須將可能的「共變項」(即控制變項，如性別、年齡、種族別等) 納入考量。

因此，根據上述中介變項的要件，本研究依據緊張理論及社會學習理論，假設緊張因素對接觸偏差同儕與偏差行為具有直接效果，接觸偏差同儕對偏差行為亦有直接效果。將緊張因素與接觸偏差同儕同時置入同一個迴歸模型時，接觸偏差同儕即會成為緊張因素與偏差行為間的中介變項。綜前述，本研究迴歸分析程序，首先建構與父親負面關係、與母親負面關係、與學校負面關係、與同儕負面關係等緊張因素對接觸偏差同儕的解釋模型，分析結果列示於表 2；其次，建構與父親負面關係、與母親負面關係、與學校負面關係、與同儕負面關係等緊張因素及接觸偏差同儕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解釋模型，共包括三個模型組，模型 1 先置入緊張因素的四個次變項及控制變項，模型 2 中，放入接觸偏差同儕變項及控制變項。在模型 3 中，同時置入緊張因素、接觸偏差同儕及控制變項檢視，分析結果列示於表 3。



四、研究結果

(一) 各變項之描述性資料分析及相關分析

此節依序說明國中生偏差行為、與父親負面關係、與母親負面關係、與學校負面關係、與同儕負面關係、接觸偏差同儕及個人屬性等變項之數值分佈情形、平均值狀況，及採用皮爾森 (Pearson) 積差。由表 1 可知，整受試者從事偏差行為次數均不多。以其圖形分配狀況來看，均呈現正偏態及高狹峰 (leptokurtic) 情形，也就是說，國中生偏差行為之分布較為集中，在次數低的一方，亦即未從事偏差行為之人數較多。在自變項方面，與父親負面關係平均數為 1.45，與母親負面關係平均數為 1.44，與教師負面關係平均數為 1.55，與同儕負面關係平均數為 1.55。其次接觸偏差同儕之平均數分別為 1.52。觀察發現，本研究樣本中之國中生與重要他人負面關係，均低於中間程度，其中又以與教師、同儕負面關係平均數最高，其次為與父親負面關係，最低者為與母親負面關係；接觸偏差同儕亦低於中間程度。

表 1 國中生各變項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 (n=422)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1	2	3	4	5	6
1.偏差行為	1.13	.21	1.00	2.35	1					
2.與父親負面關係	1.45	.54	1.00	4.00	.17*	1				
3.與母親負面關係	1.44	.53	1.00	4.00	.19*	.90*	1			
4.與教師負面關係	1.55	.64	1.00	4.00	.30*	.51*	.55*	1		
5.與同儕負面關係	1.55	.62	1.00	4.00	.10	.53*	.53*	.62*	1	
6.接觸偏差同儕	1.52	.81	1.00	5.00	.58*	.12*	.16*	.23*	.06	1

*p < .05 **p < .01 ***p < .001; 右側為相關係數



表1亦呈現與父親負面關係、與母親負面關係、與學校負面關係、與同儕負面關係、接觸偏差同儕與國中學生偏差行為間之相關分析。由初步的相關分析結果可知，與父親負面關係、與母親負面關係、與教師負面關係及接觸偏差同儕 ($r=.17$ 、 $p<.01$; $r=.19$ 、 $p<.001$; $r=.30$ 、 $p<.001$; $r=.58$ 、 $p<.001$)與國中學生偏差行為呈現統計上顯著正相關；與同儕負面關係與國中學生偏差行為則未達統計上顯著效應 ($p>.05$)。由相關分析結果可知，受測者與父親、母親、學校負面關係愈高，接觸偏差同儕愈多，其偏差行為發生的可能性愈高。此外，緊張因素的與父親負面關係、與母親負面關係、與教師負面關係與接觸偏差同儕呈現統計上顯著正相關，其中接觸偏差同儕和與教師負面關係的相關最高 ($r=.23$ 、 $p<.001$)；與同儕負面關係與接觸偏差同儕則未達統計上顯著效應 ($p>.05$)。就以上相關分析的結果來看，偏差行為與與父親負面關係、與母親負面關係、與教師負面關係、接觸偏差同儕之相關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顯示兩兩變項之間有相關性存在，故除與同儕負面關係之外，此與前述之文獻觀點大抵一致。

(二) 緊張因素與接觸偏差同儕之關聯性

本研究以迴歸分析考驗係緊張因素對接觸偏差同儕的預測效果，表2呈現分析結果。表中顯示與教師負面關係對接觸偏差同儕的預測達統計上顯著正向效應 ($B=.35$ 、 $p<.001$)，與同儕負面關係對接觸偏差同儕的預測則達統計上顯著負向效應 ($B=-.20$ 、 $p<.01$)，與父親及與母親的負面關係則未達統計上顯著效應 ($p>.05$)。即青少年與教師及同儕的負面關係每增加一個單位，青少年接觸偏差同儕分別增加.35與減少.20個單位，其決定係數 (R^2) 為 .07，表示緊張因素對接觸偏差同儕解釋力約為 7%，本研究假設 1 部分成立。研究結果顯



示，青少年與教師的關係愈負向、緊張，與同儕負面關係愈低、緩和，其接觸偏差同儕的程度愈高。在此必須注意的是，與同儕負面關係對接觸偏差同儕具有負向效應，此則留待下一章節討論。

表 2 青少年接觸偏差同儕迴歸分析與顯著情形摘要表 (n=422)

變項	B	SE	β
緊張因素			
與父親負面關係	-.14	.17	-.09
與母親負面關係	.27	.17	.18
與教師負面關係	.35***	.08	.27
與同儕負面關係	-.20**	.08	-.16
常數		1.11***	
決定係數 (R^2)		.07	
調整後 (adjust R^2)		.06	
F 檢定		7.79***	

註：*表示 $p < .05$ ；**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1$ ；VIF<5.0

(三) 緊張因素、接觸偏差同儕與青少年偏差行為之關聯性

以下茲依本研究在自變項、控制變項與偏差行為方面所建構之三個模型說明如下：

1. 模型一：檢視緊張因素的影響

表 3 模型一檢視緊張因素變項與偏差行為之關聯性部分，與教師負面關係與偏差行為呈顯著正向關係 ($B=.11$ 、 $p<.001$)，與同儕負面關係與偏差行為則呈顯著負向關係 ($B=-.05$ 、 $p<.01$)，與父親、母親負面關係則未達統計上顯著效應 ($p>.05$)。即青少年與教師及同儕的負面關係每增加一個單位，青少年偏差行為分別增加 .11 與減少 .05 個單位。至於，模型一的決定係數 (R^2) 為 .15，表示此模型對偏差行為的解釋力約為 15%，本研究假設 2 部分成立。



表 3 國中生偏差行為階層迴歸分析與顯著情形摘要表 (n=422)

變項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B	SE	β	B	SE	β	B	SE	β
自變項									
緊張因素									
與父親負面關係	-.02	.0	-.0				.01	.0	.02
與母親負面關係	.04	.0	.10				.01	.0	.01
與教師負面關係	.11***	.0	.33				.07***	.0	.20
與同儕負面關係	-.05*	.0	-.1				-.03	.0	-.0
	*	2	2					2	8
				.15***	.0	.56	.14***	.0	.53
接觸偏差同儕					1			1	
控制變項									
性別	.07***		.17	.06***		.15	.05**		.13
年級	.02		.06	.01		.05	.01		.01
父親教育程度	-.0		-.1	-.0		-.0	-.0		-.0
母親教育程度	.01		.01	-.0		-.0	-.0		-.0
家庭經濟狀況	-.0		.06	.01		.01	-.0		-.0
常數	1.06***			.93***			.90***		
決定係數 (R ²)	.15			.38			.40		
調整後 (adj R ²)	.14			.37			.39		
R ² 改變量	.15			.38			.40		
F 檢定	8.33***			41.66***			27.68***		

*, p<.05; **, p<.01; ***, p<.001.. VIF<5.0



2.模型二：檢視接觸偏差同儕的影響

由模型二接觸偏差同儕變項與偏差行為的關係可知，接觸偏差同儕與偏差行為呈顯著正向關係（ $B = .15$ 、 $p < .001$ ），意即青少年接觸偏差同儕每增加一個單位，青少年偏差行為將增加 .15 個單位；至於模型二的決定係數（ R^2 ）為 .38，表示此模型對偏差行為的解釋力約為 38%，本研究假設 3 獲得支持。

3.模型三：檢視緊張因素、接觸偏差同儕的影響

於模型三同時納入緊張因素、接觸偏差同儕及控制變項，探討其對偏差行為的影響情形發現，緊張因素變項在加入接觸偏差同儕的影響後，與教師的負面關係仍然具有影響效應（ $B = .07$ 、 $p < .001$ ），與父親、母親及同儕的負面關係則不具有影響效應（ $p > .05$ ）；而接觸偏差同儕與偏差行為則呈現顯著正向關係（ $B = .14$ 、 $p < .001$ ）。研究結果意味著，與教師的負面關係仍然保持一個獨立的，且直接影響偏差行為的效應，但同儕的負面關係則由具顯著效應轉為不具有影響效應。進一步而言，模型一雖然呈現與教師、同儕負面關係與青少年偏差行為具有直接的影響效應，但是在模型三加入接觸偏差同儕的效應後（ $\beta = .53$ ），與教師負面關係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影響則減弱了（ $\beta = .33$ 、 $.20$ ），其 β 值降低，但與同儕負面關係對偏差行為的預測效果下降，變得不顯著（ $\beta = -.08$ 、 $p > .05$ ），解釋變異量由 15% 增加到 40%（ R^2 改變量 = .40, F 改變 = 27.68, $p < .001$ ），即接觸偏差同儕在與父親、母親、教師及同儕負面關係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影響均具有中介效應，其中介效果值分別為 -.02、.04、.05、-.03，Sobel 檢定顯示與教師及同儕負面關係有顯著中介效果（ $Z = 4.2$ 、 $p < .001$ ； $Z = -2.47$ 、



$p < .05$)，與父親、母親負面關係則未達統計上顯著效應。易言之，本研究假設 4 獲得部分支持。

五、討論與結論

由上述的研究分析可知，與教師負面關係、接觸偏差同儕與青少年偏差行為存在著顯著的關聯性。以下就緊張因素和接觸偏差同儕與國中生偏差行為的關係加以說明之：

(一) 緊張因素對接觸偏差同儕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青少年與教師及同儕的負面關係對接觸偏差同儕的發生具有影響效應。從表 1 的相關分析結果發現，在不考慮其他條件或因素的同時效應時，與父親、母親、教師的負面關係與接觸偏差同儕均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意即與父親、母親及教師的關係愈負向、緊張狀態，青少年愈容易接觸偏差同儕；但是與同儕的負面關係與接觸偏差同儕則未達統計上顯著相關；此外，緊張因素變項彼此間的關係，除與同儕負面關係外均與接觸偏差同儕呈正相關。由表 2 迴歸分析結果顯示，當我們同時考量各個緊張因素變項後，緊張因素與接觸偏差同儕的關係，係以「與教師負面關係」及「與同儕負面關係」對國中生偏差行為具有影響效應（參見表 2），顯示與父親、母親負面關係，對於促發國中生偏差行為發生的效應，已被與教師、同儕負面關係要素所吸納，所以在納入與教師、同儕負面關係變項後，與父親、母親負面關係的效應隨之消失。但是有趣的是，與同儕負面關係與接觸偏差同儕呈現正向效應。這可能是青少年為了在同儕團體中獲得認同、接納，他們可能會掩蓋或漠視同儕的負向行為表現，以維繫良好



的人際關係，造成表面上的自我隱藏、順從，但內心卻是憤怒、挫折感、敵意等負面情緒，此時，其與教師間的關係如果是負向、緊張的，反而會促發他們向偏差同儕靠攏。由此也突顯出與教師負面關係（參見表 2， $\beta = .27$ ）的效應在解釋青少年與偏差同儕接觸上的意義性。亦即青少年與教師之間的關係，意涵著教師對學生合宜或不合宜的行為反應，除了影響學生的行為表現外，也會影響其受到同儕認同或接納的程度，而其反應的程度也將影響到學生接觸偏差同儕的程度。

（二）緊張因素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青少年與教師及同儕的負面關係對偏差行為的發生具有影響效應。從相關分析結果發現（參見表 1），在不考慮其他條件或因素的同時效應時，與父親、母親及教師的關係現愈負向，青少年偏差行為發生的次數愈多，與同儕負面關係與青少年偏差行為則未達統計上顯著相關。但在同時納入各個緊張因素變項後，青少年與教師及同儕的負面關係，可以預測偏差行為的發生，而與父親、母親則否，此結果與 Moon、Hays 和 Blurton（2009）的研究發現一致。惟其間仍有相當微妙的變化相當值得加以深究的是，與同儕負面關係雖達顯著的作用，但與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關係卻與 Agnew 的論述相佐，即與同儕的負面關係非但未增加偏差行為發生的次數，反而減少偏差行為次數。事實上，當納入接觸偏差同儕變項後（參見表 3 之模型 3），與同儕負面關係之顯著效應隨之消失。由此審之，接觸偏差同儕會增加偏差行為，而與同儕負面關係對偏差行為的效應可能是受到接觸偏差同儕影響所致，故在考量接觸偏差同儕的影響後，與同儕負面關係的效應即不再。這可能是國中生極容易受到所接觸同儕團體屬性的影響，而未能夠清楚辨別同儕關係，與偏差同儕的正向關係則會帶來青



少年更多的偏差行為。

（三）接觸偏差同儕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影響

從表 3 觀察發現，接觸偏差同儕對偏差行為具有正向影響效應。意即青少年接觸偏差同儕愈多，愈可能發生偏差行為，本研究結果支持以往有關接觸偏差同儕與偏差行為的實證（Barnow et al., 2004; Trucco et al., 2011; Wiesner et al., 2012）。此外，經由比較緊張因素（模型一， $R^2 = 15\%$ ）及接觸偏差同儕（模型二， $R^2 = 38\%$ ）在預測青少年偏差行為的效果時，接觸偏差同儕有著比較高的解釋變異量。

（四）接觸偏差同儕對緊張因素與偏差行為間關聯性的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當接觸偏差同儕納入到模型三時，與教師負面關係仍與偏差行為維繫著直接效應，這也顯示出與教師負面關係在預測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穩定性，惟效應降低，故接觸偏差同儕在緊張因素與國中生偏差行為之間具中介效果。但是我們也觀察到，與同儕負面關係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效應在加入接觸偏差同儕之後轉而消失。此一結果可能暗示著與同儕負面關係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影響，是植基在接觸偏差同儕的效應上，即與同儕負面關係的影響力，主要是來自於青少年與偏差同儕接觸的程度。由此觀之，青少年若是與偏差同儕交往、接觸的程度較密切，若再加上與教師關係的惡化，反而可能增進與偏差同儕間的親密與團結程度，如教師過度嚴格或不當的管教方式，將導致負向的師生關係，並可能使學生有同舟共濟、同仇敵愾的想法，在無法清楚辨識同儕良莠的情形下，使得同儕關係變得更加緊密，進而使青少年更加在意同儕團體的認同與要求，在這種情況下與同儕的



負面關係會對偏差行為產生增強效應。就整體分析結果而言，與教師負面關係、接觸偏差同儕及性別因素，在解釋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發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首先，青少年與教師的關係愈緊張、愈負向，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程度愈高，此時若再與偏差同儕接觸，反而會更加速其偏差行為發生的次數。其次，在解釋青少年偏差行為的成因時，性別更是一個複雜的影響因素。本研究顯示「性別」與青少年偏差行為存在著相關性，且男生從事偏差行為的頻率較女生高。

（五）研究建議

從研究結果得知，與教師的負面關係與接觸偏差同儕及青少年偏差行為具有直接關係。因此，建議教師應多使用各種管道與學生進行雙向溝通，加強師生間的正向關係，營造一個對等、友善的師生互動環境，青少年在獲得老師較多的正面回饋下，即使在學校裡不能有良好的學習成就，但至少還願意留在學校，放棄或排擠他們，只會使他們向偏差同儕靠攏，具有同樣偏差行為傾向之青少年群聚在一起的結果，只會使他們迅速脫離學校的監督、管理及訓練，而漂浮或遊蕩於街頭。教師並應教導青少年清楚辨識同儕的良窳，及強化道德判斷能力，瞭解與同儕的交往應建構在遵守社會規範的基礎上。此外，本研究亦發現接觸偏差同儕在與教師負面關係及青少年偏差行為間關係的影響中，扮演著具意義性的角色。建議為人師長者，應以和諧開放替代衝突緊張的班級氣氛，學生會因此感受到關心、鼓勵、支持及具有成就感，以免因為接觸偏差同儕，使其轉而藉由偏差行為表現以為抗拒、報復來自教師的拒絕、排斥，形成惡性循環。最後，應針對性別的差異，施予不同的關係互動模式，這都是有效減少青少年偏差行為出現的重要努力方向。



最後，本研究仍存在些許限制，在參考或應用上述研究發現時，必須加以注意。在研究對象方面，本研究使用的分析資料以嘉義縣市國中學生為研究母體，雖已有針對行政區域區分抽樣，但在推論時若不先設定討論的範圍與層次，分析或比較的結果可能因研究對象的不同而產生偏誤，需要謹慎面對。在研究設計方面，本研究限於研究目的，僅將焦點專注於青少年與重要他人負面關係及接觸偏差同儕之關聯性研究上，而其他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緊張因素則不在本研究的範圍內，若可在未來研究中再加入其他影響因素，如「日常生活困擾」、「自我控制」、「同儕信念及行為」的影響，或可增加對於探討接觸偏差同儕、緊張因素與偏差行為間關聯的周延性。



參考文獻

- 周憐嫻 (2008)。少年犯罪。台北：五南。
- 吳齊殷、李婷潔 (2008)。生命事件觸發青少年憂鬱症狀與偏差行為的因果機制。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2008 年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第二次學術研討會」宣讀之論文 (台北)。
- 范國勇 (2001)。少年偏差行為理論整合之預測模式。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報，2，75-100。
- 許春金、孟維德 (1997)。家庭、學校、自我控制與偏差行為。中央警察大學學報，30，225-256。
- 許春金、馬傳鎮 (1997)。少年偏差行為早年預測之研究--第一年研究報告。台北：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 黃富源 (2000)。少年暴力犯罪相關因素之研究—家庭結構、動力與社會學習觀點以論。台北：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 張楓明 (2007)。親子、師生及同儕關係對國中生初次暴力行為發生之影響。中等教育，58 (5)，74-91。
- 董旭英 (2007)。國高中生依附父母、接觸偏差同儕、傳統價值觀念與偏差行為的關聯性之差異性研究。犯罪學期刊，10(2)，29-48。
- 鄧煌發 (2001)。國中生輟學成因及其與偏差行為相關性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桃園。
- 譚子文、范書菁 (2010)。依附關係、參與傳統活動、社會緊張因素與台灣地區青少年外向性偏差行為及內向性偏差行為關聯性之研究。輔導與諮商學報，32 (1)，17-42。
- Agnew, R. (1992) "Foundation for a general strain theory of crime and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30(1), 47-87.



- Agnew, R. (2001) "Building on the foundation of general strain theory: Specifying the types of strain most likely to lead to crime and delinquenc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38(4), 319-361.
- Agnew, R. (2006) *Pressured into crime: An overview of general strain theory*. Los Angeles: Roxbury.
- Akers, R. L. (1997) *Criminological theories: Introduction and evaluation*. CA: Roxbury Press.
- Akers, R. L. (2009) *Social Learn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and Devianc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Bandura, A. (1973) *Aggression: A social learning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 Barnow, S., Schultz, G., Lucht, M., Ulrich, I., Preuss, U. W., and Freyberger, H. J. (2004) "Do alcohol expectancies and peer delinquency/substance use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ulsivity and drinking behavior in adolescence?" *Alcohol and Alcoholism*, 39(3), 213-219.
- Batsche, G. M., and Knoff, H. M. (1994) "Bullies and their victims: Understanding a pervasive problem in the schools." *School Psychology Review*, 23(2), 165-174.
- Brezina, T., Agnew, R., Cullen, F. T., and Wright, J. P. (2004) "The code of the street: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Elijah Anderson's subculture of violence thesis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youth violence research." *Youth Violence and Juvenile Justice*, 2(4), 303-328.
- Burgess, R. L., and Akers, R. L. (1966) "A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reinforcement theory of criminal behavior." *Social Problems*, 14(2), 128-147.
- Dove, M. K. (2001) "Runaway, throwaway and homeless adolescents."



- The Delta Kappa *Gamma Bulletin*, 68(1), 10-15.
- Drapela, L. A. (2006) "The effect of negative emotion on licit and illicit drug use among high school dropouts: An empirical test of general strain theory."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5(5), 755-770.
- Espelage, D. L., Bosworth, K., and Simon, T. R. (2000) "Examining the social context of bullying behaviors in early adolescence."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78(3), 326-333.
- Hawkins, J., Catalano, R., and Miller, J. (1992)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for alcohol and other drug problems in adolescence and early adulthood: Implications for substance abuse preven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2(1), 64-105.
- Hay, C. (2003) "Family strain, gender, and delinquenc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46(1), 107-135.
- Higgins, G. E., Piquero, N. L., and Piquero, A. R. (2011) "General strain theory, peer rejection, and delinquency/crime." *Youth & Society*, 43(4), 1272-1297.
- Hoffmann, J. P., and Su, S. (1998) "Stressful life events and adolescent substance use and depression: Conditional and gender differentiated effects." *Substance Use and Misuse*, 33(1), 2219-2262.
- Iselin, A. M. R., Mulvey, E. P., Loughran, T. A., Chung, H. L., and Schubert, C. A. (2012) "A longitudinal examination of serious adolescent offenders' perceptions of chances for success and engagement in behaviors accomplishing goal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40(2), 237-249.
- Israel, G. D., Beaulieu, L. J., and Hartless, G. (2001)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on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Rural Sociology*, 66 (1), 43-68.
- Mazerolle, P., and Maahs, J. (2000) "General strain and delinquency: An



- alternative examination of conditioning.” *Justice Quarterly*, 17(4), 753-778.
- Moon, B., Hays, K., and Blurton, D. (2009) “General strain theory, key strains, and deviance.”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37(1), 98-106.
- Moon, B., Hwang, H. W., and McCluskey, J. D. (2011) “Causes of school bullying: Empirical test of 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theory, and general strain theory.” *Crime & delinquency*, 57(6), 849-877.
- Montgomery, K. L., Thompson, S. J., and Barczyk, A. N. (2011) “Individual and relationship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delinquency among throwaway adolescents.”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33(7), 1127-1133.
- Olweus, D. (1993) *Bully/victim problems among school-children: Long-term consequences and an effective intervention program*. In S. Hodgins (Ed.), *Mental disorder and crime*. Thousand Oaks, CA: Sage.
- Parcel, T., and Dufur, M. J. (2001) “Capital at home and at school: Effects on student achievement.” *Social Forces*, 79(3), 881-912.
- Shader, M. (2004) *Risk factors for delinquency: An overview*. (NCJ 207540). : U. S. Department of Justice.
- Stewart, E. A. and Simons, R. L. (2006) “Structure and culture in African American adolescent violence: A partial test of the code of the street thesis.” *Justice Quarterly*, 23(1), 1-33.
- Sutherland, E. H. (1947) *Principles of criminology* (4th ed.).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 Trucco, E. M., Colder, C. R., and Wieczorek, W. F. (2011) “Vulnerability to peer influence: A moderated mediation study of early adolescent alcohol use initiation.” *Addictive Behaviors*, 36(7), 729-736.



- Tung, Y. Y. (2001) *Factors Related to Adolescent Violent Behavior in Taiwan: Testing General Strain Theory*. Presented at 2001 American Society Criminology Conference at Atlanta.
- Xiong, Z. B., Rettig, K. D., and Tuicompepee, A. (2008) "Differences in nonshared individual, school, and family variables between delinquent and nondelinquent among adolescents."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Interdisciplinary and Applied*, 142(4), 337-356.
- Zimmerman, G. M., and Vasquez, B. E. (2011) "Decomposing the peer effect on adolescent substance use: Mediation, nonlinearity, and differential nonlinearity." *Criminology*, 49(4), 1235-1273.

